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李世祥 ● 编/译

凯撒的剑与笔

Julius Caesar's Sword and Letters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刘小枫◎主编



凯撒的剑与笔

Julius Caesar's Sword and Letters

李世祥 | 编/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撒的剑与笔/李世祥编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5111-6

I. 凯… II. 李… III. 古罗马-历史-文集
IV. K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2219 号

凯撒的剑与笔

李世祥 编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天津市武清区高村印装厂

版 次: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6.75

字 数:180千字

定 价:2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在正义的极端行动和不义的极端行动之间做出客观的鉴别，
乃是纪事作家最为崇高的一项职责。

——施特劳斯

凯撒的德性

(编译者导言)

罗马的衰亡是西方有识者难祛的心病，诸多名家都要把罗马拎出来做一番评述，从阿庇安、李维、迪奥、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到吉本和蒙森等等，德国凯撒研究专家贡多尔夫在《凯撒的衣钵》^①中更是开出长长的名单，几乎把西方思想大家一网打尽。有些人谈及罗马共和国的崩塌时扼腕叹息，说到所谓的罪魁祸首凯撒时更是咬牙切齿。究其原因，罗马共和体制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主要蓝本之一，是议会两院、三权分立的雏形。罗马共和的衰亡暗示着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并不像拥趸们鼓吹的那样完美无缺、坚不可摧。凯撒的作为直指现代启蒙哲人背后的信条：制度与法律可使人恒久良善。

凯撒在西方史学中的形象无疑是由蒙森在《罗马史》^②中创立的。在蒙森眼中，凯撒是位不世出的天才人物，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军事统帅、雄辩家和作家。凯撒能够团结各种社会成分，实施超阶层的统治，其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王权，复兴罗马民族。蒙森同时认为，凯撒使西方各民族罗马化，成为欧洲所有现代文

① Friedrich Gundolf, *Mantle of Caesar*, Translated by Jacob Wittmer Hartmann, Cayme Press, London, 1908。

② T.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8 卷, Munich, 1976; *History of Rome*, W. P. Dickson 翻译, 4 卷, London, 1885。

2 凯撒的剑与笔

明的始祖。针对蒙森的凯撒神话，反应最强烈的是费雷奥^①，他认为凯撒根本就算不上杰出的政治家，不过是名运气好的投机冒险分子。凯撒在担任执政官时想像伯利克里那样建立温和的民主制度，后来千方百计地避免内战，不过却不断地犯错，即便赢得内战后，凯撒的地位也说不上巩固。

一战后，迈耶尔的《凯撒君主制与庞培元首制》^②对元首制与君主制做了比对。迈耶尔认为，元首制的形式是共和的，由元老院统治国家，首席元老应视为共和制度的保卫者，而这种制度萌生于庞培，开花结果于奥古斯都。凯撒则希望把罗马变成希腊式的王国。不过，迈耶尔对凯撒的政治活动做出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凯撒心中有明确的国家形式，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见风使舵的政客。与迈耶尔不同的是，塞姆的《罗马革命》^③把罗马共和国向帝国的过渡理解成一种革命，强调罗马的政治生活不是取决于贵族与平民、新贵与旧贵的斗争，而是取决于对权力、荣誉和财富的攫取。塞姆对凯撒的评价非常谨慎，认为凯撒并不是革命者，倒可以说是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比我们通常所认识的更保守，更像罗马人。塞姆主张我们没有必要假设凯撒要建立一个希腊式的王国，凯撒的目标不过是要消除内战的政治后果。

在凯撒的现代传记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格尔策的《凯撒：政客与政治家》^④。格尔策说凯撒虽然遇刺身亡，但仍是位胜利者，因为其后的政治框架依然按他指出的道路推进，尽管采取的形式

① Guglielmo Ferrero, *Grandezza e Decadenza di Roma*, 1902 - 1907; *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Rome*, Trans. by Alfred E. Zimmer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9.

② Eduard Meyer, *Caesars Monarchie und das Principat des Pompejus*, Stuttgart and Berlin, 1922.

③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59.

④ M. Gelzer, *Caesar der Politiker und Staatsmann*, Wiesbaden, 1960; *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Trans. by Peter Needha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更为缓和。在格尔策眼中，凯撒善于处理日常政治事务，同时又不忽视重大目标。凯撒天资卓著，行事敏锐，果敢无畏，这使他超越了同代人，但仍是地地道道的罗马人。不过，凯撒的天才让他飞得太高，以至没有人能跟得上他的步伐。格尔策的传记明显带有为凯撒辩护的色彩，有学者甚至认为格尔策复活了蒙森的观点。

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关于凯撒的功过虽聚讼纷纭，凯撒却担得起这三项。凯撒终结共和，开启帝制，他个人的名字成了后世君主的集体用语，征高卢、平庞培，成为西方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齐名。据说，凯撒对亚历山大念念不忘，而拿破仑对凯撒则牢记于心。凯撒治军的严厉、作战的勇敢迅捷都成为军事史上的佳话。征战之余，凯撒撰写了《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此外还有政论文《反卡图》、关于文学创作的《论类比》和大量的情书，可惜均已散佚。凯撒的战记简洁、朴实、流畅，看上去自然随意，实际上却可能暗含着细密的心思，堪称后世战记的典范。而在“三立”之中最为复杂、争议最多的莫过于凯撒的德性。

“德性”的拉丁文是 *virtue*，指事物好的状态，从辞源上讲，最初的意思是勇气或阳刚，后来泛化为能力的卓越，尤其道德上的卓越。德性内涵的每一次变化——从能力到道德，再从道德回到能力，都是西方思想史上惊心动魄的转折。可以罗列在凯撒头上的德性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几项是仁慈、理智、高贵、勇敢和果断。库尔特对凯撒的仁慈做了精彩的分析，笔者不再赘言（见“凯撒的仁慈”）。关于理智，斯克莱纳日认为，当凯撒为喀提林辩护时，“其言论直到辩论结束都将理性等同于善，而他的整个论证都是从理性的角度来定义善”（见《凯撒、卡图与撒路斯特的道德言辞》）。理性的含义有三层，一是表智力，与体力相对，另一层是表逻辑思辨，与情感相对，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还有一层是指理智德性，相对应的是道德德性。凯撒身体不好，但却有着充

4 凯撒的剑与笔

沛的精力，其行军速度往往令敌人措手不及，他在军事上的成功与其说是身体的优势，不如说是源于坚定的意志和敏锐的判断。凯撒认为，作战要以智取胜，要动脑子，不可一味蛮勇。史密斯在《密谋与密谋者》中指出，凯撒的行动基于理性，布鲁图斯等密谋者则出于情感，两方各有正当理由，但又都没有照顾到对方的感受。凯撒清醒地意识到共和国业已腐败和无能，它的灭亡实属必然，思考必然性恰恰是理性的主要特征。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虽然也对共和国的问题有所认识，却无法相信其必然消亡。共和在密谋者血液里流淌，他们作为失败者承认凯撒的独裁官地位，但条件是凯撒必须是共和国的独裁官。当凯撒突破了这一点时，共和派在情感上就无法接受。或许双方并不像通常说的那样是善与恶的争斗，他们可能都是怀着良好愿望的天使，悲剧在于，是无法共存的天使。

亚里士多德说，各种道德德性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赋予的，只有自然的品质加上努力，才会使得行为完善，自然的德性也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性。^① 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即知识，人们做恶并非出于自愿；而亚里士多德则持不同意见：德性（作为品质）与逻各斯（理智的知识）一道起作用，如果一个行为也出于品质，那么它就是出于意愿的，因为品质本身最终是在我们能力之内的、出于我们的意愿的。^②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德性与理性呈现出一种紧张，理性并不必然等于德性，有时甚至突破德性的束缚，智识卓越的人未必就有高尚的灵魂。亚里士多德把审慎（σωτηρησύνη）列入没有逻各斯的道德德性，但我认为审慎可能处于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它既源于天性，也来自理智。凯撒的聪敏毋庸置疑，但他是否拥有一颗高尚的心？即便凯撒洞察到了必

①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189。

② 《尼各马可伦理学》，前揭，页190，注1。

然性，他是否对此保持了足够的审慎？

凯撒举止优雅，气度雍容，出身古老的朱利安家族却终其一生都为平民派的代表。贵族与平民的划分最早可追溯至罗慕路斯和雷姆斯建城时的两座山丘，帕拉丁和阿文丁。当雷姆斯满不在乎地跳过标示着两山界限的矮墙时，罗慕路斯挥剑杀死了自己的弟弟，^①从此帕拉丁和阿文丁成为胜利与失败、荣耀与耻辱的符号，也成了萦绕着罗马人生命的两端。贵族与平民的真正界限不是矮墙，而是胜利和荣耀，当朱利安家族失去了这些时，他们就不得不搬出帕拉丁，将宅院混杂在妓院、酒馆和犹太教堂之中。凯撒孜孜以求的就是胜利和荣耀，权力不过是实现二者的一个必需的阶梯。施密特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不是活人与死人的争斗，而是活人与活人的较量。凯撒对此非常清楚，只有健壮蓬勃地生活在现世，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追求功业的欲望虽可导致罪恶，但消除这种欲望会导致更大的罪恶——泯灭卓越。撒路斯特在《喀提林阴谋》中曾说：

但是最初使人们的心灵受到触动的与其说是贪欲毋宁说是野心——野心确实是一种缺点，但是它还不算违背道德。因为光荣、荣耀和帝国，这些是好人和卑劣的人同样热烈期望的，只是前者依道而行，但后者没有这些好的技艺，就靠狡诈和欺骗追求。(11: 1-2)^②

在撒路斯特看来，追求胜利和荣耀是使人成就卓越的途径，凯撒与喀提林都追求荣耀，区别在于凯撒“依道而行”，而喀提林靠的是“狡诈和欺骗”。

在凯撒的德性表中，勇气具有非常突出的位置。据普鲁塔克

① 夏尔克著，《罗马神话》，曹乃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页79~80。

② 《喀提林阴谋》，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101。

记载^①，凯撒在返回罗马的途中曾被海盗掳获，他认为海盗开出的赎金太低，有损自己的身价，主动从 20 塔伦特提高到 50 塔伦特。凯撒与海盗们一起游戏，并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他会钉死他们，结果凯撒说到也做到了。这是凯撒勇敢的一个经典事例，评论家们认为这说明凯撒要么是胆略过人，要么是孤注一掷的亡命徒，但不管怎样，人们对凯撒的勇敢皆表认同，毕竟鲁莽也是过度的勇敢。英勇（*ανδρεία*）是柏拉图四德之一，在《王制》（又译《理想国》，429C）中，苏格拉底对勇敢的定义是“（勇敢）就是保持住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可怕事物——即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可怕——的信念”^②，但又补充说，如在“勇敢”上再加一个“公民的”限定词，也是对的（430C，前揭，页 149）。廖申白认为，柏拉图所说的公民的勇敢与奴隶的和兽类的勇敢相对，而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公民的勇敢尽管也不同于奴隶的勇敢和兽类的勇敢，但仍然不是真正的勇敢，因为它是出于对荣誉的期求或对耻辱的躲避，而不是出于对美善（即高尚〔高贵〕）的期求。^③问题是真正的勇敢与公民的勇敢有多大的距离，做一个好人与做一个好公民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勇敢的极致是不怕死，那么在何种情况下敢于面对死才算是勇敢？亚里士多德自问自答：

也许是那些最高尚〔高贵〕的场合，也就是在战场上？
因为，战场上的危险是最重大、最高尚〔高贵〕的。所以不论是城邦国家还是君主国家，都把荣誉授予在战场上敢于面对死亡的人们。^④

① 普鲁塔克，《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包利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页 364。

② 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页 148。

③ 《尼各马可伦理学》，前揭，页 82，注 1。

④ 同上，页 78。

荣誉与勇敢密切相联，勇敢赢得荣誉，而荣誉又令人“保持住”要勇敢的信念，但有一个前提，好人就是好公民，好公民就是好人，两者并无冲突。领教了凯撒勇敢的不只是罗马的敌人，还有罗马人。依照柏拉图的观点，城邦的护卫者应具有狗的品性，对外人凶狠，对城邦良善。但这不过是柏拉图的一个美好设计罢了，卓越的人物既可为大善，也可行大恶，让敌人抱头鼠窜的往往也会令自己人心惊肉跳，古希腊发明陶片放逐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凯撒最为大胆之举便是跨过卢比孔，甘愿成为公敌，进军罗马，让庞培和众多元老措手不及，落荒而逃。对于这一事件，普鲁塔克、苏维埃托尼乌斯和阿庇安做了不同的记叙。

在普鲁塔克的笔下，凯撒的心情最为复杂，性格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当他到达了把山南高卢与意大利其他地区分隔开来的那条河流时，凯撒陷入深思，现在他已经越来越接近可怕的一步，他为所要冒的巨大危险焦虑不安，放慢了速度。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沉默良久，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决心来回摆动，他的盘算改过来、改过去。他又用了很长时间与在场的朋友讨论局势，包括阿西尼阿斯在内，想到如果他们过河，则将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灾祸，同时又想到他们将留给子孙后代的威名。最终，在一股激情的推动下，他丢开了一切顾虑，把自己交付给未来，说出了一句冒险一搏的人常说的活：“骰子已经掷下了。”于是跨过了河。^①

在苏维埃托尼乌斯的描述中，凯撒在卢比孔对身边的人说，现在还可以回头，一旦跨过河流，就只能靠武力解决了。正当凯撒犹豫不决时，有个俊伟的人物坐在附近吹芦笛，那人突然抢过

① 《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前揭，页389。

士兵手中的号角，吹响了进攻号并跳入了水中。凯撒顺势喊道：“前进，向神的信号和敌人倒行逆施所指的方向！命豁出去了！”^①阿庇安则没有加入这种神话成分：

当他到达意大利边界的卢比孔河畔的时候，他停下来，注视着河中的流水，心中盘算着武装渡河将引起的后果。凯撒从思考中回过神儿后，对身边的人说：“朋友们，如果不渡河的话，我会遭遇到许多灾难；如果渡河的话，整个人类将祸患连连。”于是他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一样，一冲就渡过了河，口中说出一句俗语：“骰子已经掷了，就这样吧！”^②

尽管版本不同，但都说明凯撒在行动之前非常谨慎小心，既在估量有多大胜算，也可能在思考这样做身后会留下什么样的声誉。当个人卓越与共同福祉发生冲突时，凯撒最终选择了个人卓越，阿庇安引用的那句话简直是“宁可我负天下人”赤裸裸的翻版。一旦做出选择，凯撒就毅然决然地付诸行动，这是他一贯的果断风格。

但我们不能轻易就此对凯撒做出道德判断，把他说成共和国的罪人。从罗马整个社会来看，人民已经腐败，政治堕落不堪，原有的机制难以为续，卡图坚持的道德标准对他人来说不过是痴人说梦。维护着传统道德的古典宗教使罗马追求扩张和荣耀，当帝国面积拓展后必须要改进原来的体制以适应新的局势，这逐渐会导致罗马人丢弃古老的风俗，追求享受，生活开始腐化，并将异族人容纳进来，政治共同体由封闭变为开放，实际上为普世性宗教开了方便之门。如此看来，罗马扩张与衰亡之间有一个必然

① 苏维埃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页18。

② 《罗马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131，有改动。

的结，无法摆脱，任何想使国家永远强盛的努力都是徒劳。民众的监督的确可以维持政治清明，但当民众败坏了，结果又会如何？反对一个腐败和罪恶的共同体，惩处散发着恶臭的人性，这似乎是上苍赋予凯撒的一项职责。

有学者认为凯撒问题的实质是君主专制与自由共和的对立，即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什么是最好的政治体制。^① 西方近代思想名家对凯撒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他们在这问题上的分歧，但丁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打入地狱最底层，马基雅维里和十八世纪则把他们奉为诛杀僭主的伟人、自由的斗士。因循由诸神转为一神的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但丁认为凯撒体现着一种“单一”意志，是上帝在世间的代表，与统治着世界的“主”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杀凯撒，不仅玷污了友谊，更是违背了神意。^② 萨卢塔蒂在为但丁进行辩护时对他为何把两人与犹大一起放在三头魔王卢奇费罗（Lucifer）的嘴里做了解释。萨卢塔蒂^③认为，但丁把三人发送到曾经因傲慢而反叛过造物主的魔王那里非常合理，因为犹大背叛了耶稣，而后两人则是背叛了其统

① Peter Baehr, 《凯撒与罗马世界的衰落》（*Caesar and the Fading of the Roman World*），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页2。

② 但丁的原文在《神曲·地狱》三十四章：

我的老师说：“那儿上面那个头在嘴里、腿在外面乱动的、受最大刑罚的是加略人犹大。头朝下的另外那两个当中，那个从黑面孔的嘴里垂着的是布鲁都：你看，他怎样在那儿拨动着身子，一言不发！那一个是卡修斯，他看起来肢体那样健壮。但是夜晚又回来了，现在我们该离开了，因为我们全看完了。”

田德望先生在注释中说“但丁认为罗马帝国是天意为保障人类享受现世生活的幸福而建立的，凯撒是始皇帝，布鲁都背叛了他，把他刺死，是获罪于天，理应受最重的惩罚”（《神曲·地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页248）。

③ Salutati, C. 1925, “De Tyranno”. 选入 E. Emerton, *Humanism and Tyranny: Studies in the Italian Trecento*, 由 E. Emerton 翻译,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页113-114。

治正当性源自神意的凯撒。但丁看到了这桩桩件件背后的逻辑，主已经命令所有人事必须由罗马中的一人独自管理，作为费尽心机反对神的计划、想种种办法抑制这一律令的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被打入地狱岂不实属必然？凯撒在但丁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了基督教的异教圣徒。弗劳德则进一步指出，此世王国创建者的命运与非此世王国创建者的命运惊人地相似，因为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铺垫。^①

如果说但丁因基督教而诅咒布鲁图斯，这也恰恰是马基雅维里赞美他的一个重要理由。在马基雅维里眼中，凯撒是个十足的僭主，罗马的第一位专制者，凯撒之后罗马城再无自由，布鲁图斯杀他正是为了共和国与自由。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中共提及凯撒约三十次，在第一卷第十章说：

人们听到作家们为凯撒歌功颂德，并不会为他的名望所骗；因为那些赞美他的作家，既被他的好运所毒化，又怯于帝国的长久；这个由他御宇的帝国，不容作家们秉笔直书。不过，作家若能秉笔直书，会对他有所评议，只消看看他们对喀提林说了些什么，即可一目了然。凯撒如此受人憎恨，与其说是因为他的作恶当受谴责，不如说是因为他存心作恶。也可以看看他们对布鲁图斯的称颂，他们怯于凯撒的强权，不敢羞辱他，便推崇他的敌人。^②

马基雅维里称道布鲁图斯是为了反凯撒，反凯撒则是为了颠覆强大的基督教传统。他通过异教反对基督教，真正的用心在于从政治的角度清算所有的宗教，凭靠人的而非神的力量建立一种

① J. A. Froude, 《凯撒速描》(Caesar: A Sketch), New York and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879, 页 436。

② 《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版，2005，页 75。